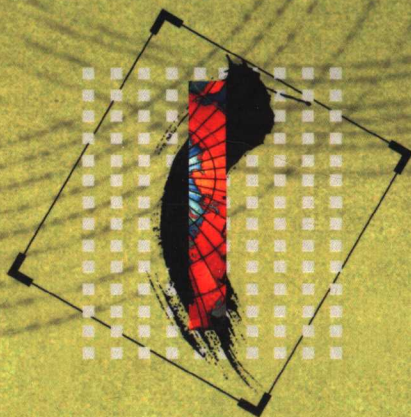


21世纪通识教育系列教材

中西文化比较概论

ZHONGXI WENHUA BIJIAO GAILUN

王前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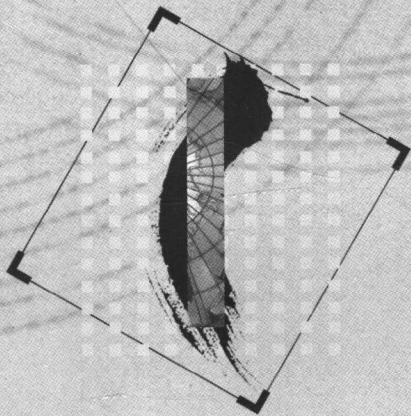


21世纪通识教育系列教材

中西文化比较概论

ZHONGXI WENHUA BIJIAO GAILUN

王前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西文化比较概论/王前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1世纪通识教育系列教材)
ISBN 7-300-06860-X

- I. 中…
- II. 王…
- III. 比较文化-中国、西方国家-教材
- IV. 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9800 号

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1世纪通识教育系列教材
中西文化比较概论
王前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雅艺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5毫米 1/16	版 次	2005年10月第1版
印 张	16.75 插页1	印 次	2006年10月第2次印刷
字 数	305 000	定 价	1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通识教育，有人称素质教育，也有人称博雅教育。无论如何称呼，其目的都是使受教育者不仅掌握必备的知识和能力，而且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健康人格，成为全面发展的创新人才。当代大学生应该具备哪些知识、能力和素质，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来看，大学生不论学什么专业，都应该是复合型的高素质人才，除了掌握某个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之外，最重要的是具有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目前，从教育部到各个高校都充分认识到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重要意义。在教育部的倡导下，各个高校都开设了各具特色的通识课程。但是，课程不够系统，教材缺乏适用性，甚至没有教材的情况较为普遍，不利于通识教育广泛而有效地开展。

为了满足全国普通高校开设通识课程的需要，我们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和对几十所大学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推出“21世纪通识教育系列教材”。其宗旨是拓宽学生的视野，扩大其知识面，提高其人文素养，塑造其科学精神。我们将陆续出版由兼具专业功底和教学经验的优秀作者编写的、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系列教材，为我国的人才培养服务，为高等教育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目 录

(09)
(181)
(192)
(203)
(204)
(229)
(239)
(248)
(250)
(290)	引言 “用心”与“动脑”——中西文化比较的起点..... (1)		
	一、“用心”与“动脑”的区别..... (2)		
	二、“用心”与“动脑”的生理和心理根据..... (5)		
	三、“用心”与“动脑”的不同后果..... (9)		
	第一章 本体论的分野——“天人合一”		
	与“征服自然”..... (13)		
	一、“天人合一”的漫漫心路..... (14)		
	二、“征服自然”的功过历程..... (39)		
	三、人与自然的重新定位..... (57)		
	第二章 认识论的反差——直观体验与逻辑分析..... (64)		
	一、体验的心灵奥秘..... (65)		
	二、逻辑的认知力量..... (87)		
	三、综合与创造..... (106)		

第三章	方法论的对立——变通与规定	(114)
	一、穷变通久，过犹不及.....	(114)
	二、严守规定，超越局限.....	(135)
	三、现代生活中的变通与规定.....	(150)
第四章	模式论的两极——机体与机器	(158)
	一、机体模式的孕育与演化.....	(158)
	二、机器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181)
	三、机体与机器的互动.....	(195)
第五章	知识论的差异——心术与技术	(203)
	一、心术的历史与现实.....	(204)
	二、技术的起源与变革.....	(229)
	三、现代技术的文化走向.....	(239)
	结 语	(248)
	参考文献	(250)
	后 记	(260)



引言

“用心”与“动脑” ——中西文化比较的起点

自“西学东渐”以来，文人学者们关于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一直绵延不绝，有关的著述相当丰富，思考的角度不断翻新。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比较更成为思想界的热点。眼下，要想在一部中等篇幅的著作中全面展开中西文化比较的宏大场景，已经很困难了。比较切合实际的做法，是只从一个特定角度或侧面展开讨论，力求从中阐述出新意，这样才有可能丰富深化已有的认识，而不至于泛泛而论，做皮毛文章。究其一点，兼顾其余，虽有流于片面之嫌，但可以包容某些较为深刻的见解。

我们这里展开的中西文化比较，是从思维方式的角度切入的。人们的思维方式是文化的核心因素，思维方式的差别是文化差异的本质体现。在西方，“思维”（thinking）与逻辑和理性密切相关。西方文化自古以来注重理性思考和哲学反思，充满哲学思辨色彩的学说层出不穷。而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中国古代是缺乏逻辑和理性的，学者大都是散文家和诗人，孔夫子尤甚。^①这种看法尽管有些

^①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在中国的宗教和哲学里，我们遇见一种十分特别的完全散文式的理智”。参见《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13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偏颇，但中国古代文化的确不大重视逻辑推理，而是强调直观体悟。悟性的高低是判断一个人聪明才智的基本指标。思维方式上的这种差别，是在中西文化的观念深处发生的，进而影响到中西文化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从这个角度切入，可以看到以往为人们忽视的许多重要差异，使中西文化的比较有可能得到进一步深化。

中西文化的比较面临一些方法上的困难。现在学校里讲的哲学教科书上的思想方法，基本上是在西方逻辑分析的思维框架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强调主客体差别和对立，注重概念、判断、推理的功夫。关于“悟性”，仅在思维的非逻辑因素作用中略有提及，并未展开。像中国古代哲学中“心”、“气”、“象”、“器”等等范畴，似乎只具有历史意义，并无现实价值，在现代哲学教科书体系中基本没有位置。因此，注重“悟性”的思维方式尽管很有特色，很多人感兴趣，但其研究难以展开，其功能和机理至今仍然笼罩着一层神秘面纱。这就使中西文化的比较难以在思维方式的层面上进行，人们大都在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宗教、民俗等具体活动层面上做文章。不过，在经历多年积累而有了大量素材和新的研究成果之后，尤其是西方现象学和解释学研究兴起之后，情况开始有所改变。人们可以从不同思维方式的相互比照和相互诠释中发现一些新问题，提出一些新观点，因而中西文化比较的层次可以逐渐向“形而上”的层面发展。本书从思维方式比较出发展开的思路，就是在这样一种思想背景下逐渐形成的。这种比较研究的突破口在于寻找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认识主体，这就是将西方注重逻辑和理性的思维更多地同“脑”联系在一起，因为理性的思考总是要“动脑”的；另一方面，将注重直观体悟的思维更多地同中国人经常挂在嘴边的“心”联系在一起，因为体悟世界总是要“用心”的。由此观之，可以发现中西文化分别属于两种不同思维类型：西方文化主要是“动脑”的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用心”的文化。

在人们日常思维活动和语言交流中，很少有人仔细区别“用心”与“动脑”所具有的不同文化内涵。因而这个问题值得仔细推敲一番。在中西文化比较方面，“用心”与“动脑”的区别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然而这种区别以前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一、“用心”与“动脑”的区别

现在稍有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人是用大脑思维的，然而现代中国人仍然习

惯于说“用心学习”、“心想事成”、“心领神会”……这就带来了一个值得琢磨的问题：“用心”与“动脑”是不是一回事？

有些人认为两者是一回事。^①就“用心思考”与“动脑筋思考”这两种说法而言，在许多场合似乎并无明显差别，可以互相替代。可是在某些特定场合，“用心”和“动脑”看来是很难互相替代的。比如“刻骨铭心”绝不能说成“刻骨铭脑”，“打动人心”绝不等同于“打动人脑”，“心心相印”绝不只意味着在脑子里互相有个印象。“用心”往往意味着更深沉、更执著、更富有情感的认识和体验，而“动脑”则往往是按部就班、条分缕析的理性过程。两者显然不能等同起来。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相信人们用心来思维，即孟子所谓“心之官则思”（《孟子·告子上》），或如《墨经》上讲：“循所闻而得其意，心之察也”。直到清朝时王清任才提出“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②然而在人们普遍接受人用大脑思维的观念之后，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大量使用“用心思考”之类说法，而且彼此交流起来并不感到丝毫困难。这就更值得琢磨：难道中国人真的相信人是用“心”思考的吗？进一步说，这个“心”与心脏是什么关系？现代中国人仍然在讲“用心思考”，这是一种顽固的常识性错误，还是别有缘由？

与中国人的流行观念相反，西方人自古以来很少有人相信人是用“心”来思考的。^③早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古希腊的医学家阿尔克莽就通过解剖发现大脑是感觉和理智活动的中央器官。^④后来古希腊的“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和古罗马的名医盖仑，以及绝大多数西方学者，都坚持这一见解。德谟克利特认为人的灵魂分为思想、意气和欲望，分别位于脑、心脏和肝脏。柏拉图认为作为灵魂的一部分，专司感性的欲望在胃里，沉湎于愤怒和好斗的情欲在心中，而最高贵的理性在头脑中。^⑤自盖仑发现心脏与血液的密切关系后，西方人就很难把心脏

① 比较典型的说法如《实践论》所指出的：“《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里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张立文先生也曾谈到“人脑是意识的物质载体，中国古代把这个思维器官称为心”（参见张立文主编：《心》，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不过张先生也在这一页的附注中提到，心脏有可能通过微量分泌对人的思维产生影响。

② 参见《医林改错》，上卷，脑髓说。李时珍在此之前也提出过类似观点，但不如王清任说得这样明确。

③ 亚里士多德是少有的几个例外之一，他认为心是思维的器官，而大脑不过是冷却器官而已。参见[英]W. C. 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7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④ 参见[英]W. C. 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63页。

⑤ 参见王元明：《灵魂的奥秘》，12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

与思维联系在一起了。实际上，从解剖学角度，脑与思维的关系是明显的（盖仑区别了脑神经和脊神经，前者司感觉，后者司运动）。而希波克拉底早就发现了心室和心房，其结构与思维无关。不过，由于解剖知识不够充分，18世纪以前的神经生理学都还带有某种思辨性质。如盖仑认为血液是食物在肝脏里变成的，然后和天然元气相结合而富于营养，血液在心脏里同空气相混合带上“生命元气”而具活力，又在大脑中生出“动物元气”，沿神经流动，完成人体各种高级功能。16世纪比利时的维萨留斯仍接受这种观点，但他说他弄不清楚大脑如何执行想像、推理、思维、记忆的功能。^①18世纪瑞士生物学家哈勒发现人脑通过神经接受感觉，并通过神经传送引起如肌肉收缩那样反应的神经冲动。1811年奥地利医生加尔提出人的能力同大脑一定部位相结合，相应引起颅骨隆起，他提出的“颅相学”有许多牵强附会成分。1816年法国科学家布洛卡发现大脑皮层上的言语中枢，1873年德国的韦尼克发现脑特定部分损伤造成感觉性失语症，由此开创脑功能定位学说，脑神经生理学才进入现代阶段。时至今日，大脑作为思维器官已有了充分的科学根据，逐渐为人们普遍接受。尽管西方语言中也有类似英语“heart to heart”（贴心地、诚恳地）、“learn by heart”（记住、背下）等说法，但主要表达情感和记忆方面的心理活动，与思维无关。中国人讲的作为思维器官的“心”，译成英语时通常都是“mind”（即理智、智能、精神等等），与心脏没什么联系，这样西方人才能听得懂。实际上，在现代神经生理学出现之前，特别是在医学知识很不充分的古代，无论是相信用心思考还是相信动脑思考，都有相当多的直观和猜测成分，为什么中国人一直相信“用心”而西方人基本上坚持“动脑”呢？

实际上，中国人相信“用心”和西方人坚持“动脑”，本身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现象，体现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差别如果不从文化比较角度解释，是很难说清楚的。

“用心”与“动脑”的区别，是中西两种文化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本质差别。从这样一个视角展开讨论，不仅可以理清很多文化现象的内在脉络，而且能够看到一些从其他视角难以发现的东西。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初看起来似乎都不成问题，但却不是很容易回答的，而且平素人们很少琢磨，这其实就是很少从文化比较角度想问题的缘故。

“用心”与“动脑”从根本上讲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两种差异明显的思维方式。“用心”的特征在于注重心物交融，直观体悟，知情意相贯通，“用心”获

^① 参见 [英] W. C. 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104、186页。

得的许多知识和技艺是“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而“动脑”的特征在于强调主客二分，逻辑推断，理性至上，“动脑”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力求有严格精确的表述。很难说“用心”与“动脑”孰优孰劣，两者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并且对中西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了各自不同的深远影响。中国人几千年来强调“用心”，造就了源远流长的古代文明和辉煌的古代科技成就，但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在近现代的发展速度。西方人自古以来注重“动脑”，导致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兴起和社会经济加速度发展，但也一度带来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方面的社会问题。现代神经生理学的研究表明，所谓“用心”并不是真的用心脏来思考，所谓“动脑”也并不是动用了大脑所有部分。“用心”与“动脑”是人们侧重发挥大脑以至整个中枢神经系统不同部分作用的体现，由此造成这两种不同的思维类型，进而导致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

二、“用心”与“动脑”的生理和心理根据

现代神经生理学研究已经弄清楚，人的大脑的不同部位对思维过程有不同的影响。人的大脑分左、右两个半球。大脑左半球（也称左脑）主要担负语言、计算、分析、逻辑推理等活动，而大脑右半球（也称右脑）主要担负空间把握、艺术欣赏、想像、直觉等活动。大脑两半球通过胼胝体相联结，在思维过程中互相补充，协调行动。西方文化中强调“动脑”，实际上主要强调大脑左半球的功能。而中国文化所谓“用心”，就其注重直观体验，“可意会不可言传”而言，显然是在强调大脑右半球的功能。换言之，这意味着中国古代人在不知道左右脑区别的情况下，实际上把右脑思维当成了“用心”思维。“动脑”强调分析的严格性，“用心”强调认知的整体性，这种差别与左脑和右脑的生理结构差别也有明显对应关系。^①此外，大脑皮层的古老结构，即边缘叶（大脑皮层内面）加上皮下细胞核团、下丘脑、丘脑前核组成的边缘系统，也影响着人的思维活动。边缘系统调整着感官与内脏器官，又称“内脏脑”。它与大脑思维活动相关联，又协调着无意识的自主神经系统。人的情绪对思维过程的激活作用，也是通过边缘

^① 神经生理学研究表明，左右脑的生理结构和功能之间有明显对应关系。左脑许多功能非常清楚地同一定区域联系着，这些区域都很好地互相隔离。右脑的局部划分不很精细，半球的宽阔区域都参加完成任何一种行动。参加执行严格既定任务的神经元在此扩散得很厉害，并且同从事其他工作的神经元相混杂。参见〔苏〕谢尔盖耶夫：《智慧的探索》，253~254页，北京，三联书店，1987。

系统整合的。^①提到与内脏相关的边缘系统，使人马上会联想到心脏与脑的关系。尽管新闻媒体有过置换心脏使人性情大变的报道，据说有的科学家还提出过“肠脑”的设想，但内脏器官直接影响思维过程的说法尚无充分证据。^②不过内脏器官尤其是心脏通过大脑的边缘系统影响思维活动，倒是同“用心”思考中知情意相贯通的特点相对应的。人们平常所说的不狂躁、不固执、不大起大落的平和“心态”，对于客观而冷静的思维显然是极重要的条件，而这种“心态”显然又是同心脏的生理状况密不可分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满腹经纶”、“一肚子学问”之类说法，也体现了“内脏脑”的独特作用。^③肚子里装的本来是五脏六腑，怎么会有“学问”呢？这正是因为五脏六腑会将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身心体验汇总起来，通过边缘系统进入大脑，从而参与了学问的制造过程。中医认为心与小肠相表里，心为里，肠为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也有许多以为肠子参与心理和情感活动的说法，如“诉衷肠”、“热心肠”、“牵肠挂肚”、“断肠人在天涯”之类说法等等，可见一斑。

由此看来，“动脑”的思维类型是左脑发挥主导作用的思维类型，而“用心”的思维类型是右脑、边缘系统这些头脑中“非左脑”部分发挥主导作用的思维类型。日本学者岸根卓郎曾认为“西方人是左半球占优势的左脑型，东方人是右半球占优势的右脑型”。^④不少学者持有类似看法。可是，如果仅从左右脑的差别来区分东西方思维特征，未能把边缘系统及身心体验的因素考虑进去，还不如概括成“动脑”与“用心”的区别来得确切。人们或许会说，尽管“用心”思考所描述的思维形态有现代神经生理学的根据，毕竟把“心”当做思维器官是一种误解。实际上，以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的“心”就是指心脏，而且是西方解剖学意义上的心脏，这才是真正的误解。中医的确是相信“心之官则思”的。《黄帝内经》称：“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⑤。现代中医

① 参见孟昭兰：《人类情绪》，143~14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② 《列子》上说扁鹊做了一个置换心脏的手术，交换了两个人的心思，但外貌和意志力不变。现在看来这只是一个传说，但现在某些报刊媒介上也有一些报道。参见严春友：《精神之谜》，142~14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③ 林语堂曾说过腹部是贮藏情感之处。由于没有人可以完全不用情感来思维，所以他倾向于认为人们用腹部和脑袋同时思考。参见林语堂：《中国人》，213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中国古代的禅宗也有类似的看法。日本学者铃木大拙指出，中国人和日本人在遇到某些困难时，常常说：“用你的肚子好好想想”，肚子代表人之存在的整体，而头脑则是身体上最晚发展起来的部分，代表理智。头脑是有意识的，腹部是无意识的，禅宗的公案要靠腹部解决。参见〔日〕铃木大拙等：《禅宗与精神分析》，63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

④ 参见〔日〕岸根卓郎：《文明论——文明兴衰的法则》，4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⑤ 《灵枢·邪客》。

仍然持有同样的看法。^① 不过中医所说的“心”并不等同于解剖学意义上的心脏。中医的“心”是一个功能模型，指的是主宰整个高级中枢神经活动的功能器官，包括脑在内。古代中医认为思维是精气化生，而精气附于五脏和血脉。血由心出，精神必然也由心出，然后上升汇集于脑，所以称“头者，精明之府”^②。而且“心”与脑连成一体，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中国古代也讲“思”，可是对“思”的理解就与西方有根本性的差别。“思”同“心”和“脑”都是密切相关的。“思”的篆文写法下面是“心”，上面是“囟”，指婴儿颅骨的前囟（即通常所谓“囟门”），这表明思维下从心，上从脑。如《说文解字注》中讲：“自囟至心如徐，相贯不绝也。”康有为在了解到西方关于大脑是思维器官的知识之后，仍认为“心者，人体之精灵，凡知觉运动、存记构造、抽绎辨决、情感理义，皆是也，包大脑小脑而言”。谭嗣同则主张心与脑交相为用。^③

还有许多古代学者干脆认为具有认知功能的“心”与心脏并无关系。孔子、孟子、荀子以及后来的宋明理学，所论之“心”都不是指的心脏。孟子引孔子的话说：“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④ 这操舍存亡之心哪能是心脏呢？《礼记·大学疏》中讲：“总包万虑谓之心。”孟子讲：“仁义礼智根于心。”《医宗金鉴》上讲：“形之精神处名心”。王阳明讲得更明确：“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⑤ 不过，把“心”看做思维器官，毕竟不能说与心脏毫无关系。不然的话，为什么不把肝、胃、肾看做思维器官呢？为什么中国古代有“心学”而无“胃学”呢？从生理特点上看，中国传统文化知情意相贯通的思维特点，很可能更多地与心脏的生理状态相关。知情意三者本应和谐一致。和谐的破坏会导致“心痛”、“心烦”、“心力交瘁”等症状，因而古代贤哲们在思维时会更多地关注心的状态。与此相对应的是，西方文化的抽象思维和形式逻辑较发达，又是字母组合文字，因而更多地发展了大脑左半球应担负的思维活动。当这种思维活动负担过重时，脑的生理功能会有明显变化，出现“头痛”、“头昏”等症状，因而脑的状态就容易成为人们注意的对象。这或许可以

① 现代中医的解释是：“心，五脏之一，与小肠相表里。主神明，是精神、意识、思维等高级中枢神经活动的主宰，对其他脏器的功能活动起领导作用。”参见《中医大辞典》，74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② 类似的说法还有“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参见《素问·灵兰秘典论》。

③ 参见张立文主编：《心》，338、353页。

④ 《孟子·告子上》。

⑤ 《传习录》卷下。

解释，为什么在医学知识尚不发达的古代，中国人会相信“用心”而西方人会主张“动脑”，这很可能是不同类型的思维活动的负担过重时给人们的不同提醒，而且这种差别只能是不同文化传统的产物。

中西文化自古以来在“用心”和“动脑”上的分野，还可能有一些社会形态和地理结构等外部差别造成的心理上的原因。中国古代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中心（故称“中国”或“中土”）。在封建君主体制中，君主又是政治生活的中心。“中心”的地位十分高贵，因而作为人体之“中心”的“心”，很容易同人最可贵的灵魂、精神联系在一起，由心来主宰思维及其他一切活动（故而《黄帝内经》称“心”为“君主之官”）。这种观念至今在习语中仍有表现，比如一般称“首都”为祖国的“心脏”而非“头脑”。与此相对应的是，古代欧洲文明发端于地中海沿岸而非内地。古代欧洲没有形成地域辽阔的大一统国家，当然无所谓中心。“心”的地位也不是被特别看重的。另外，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注重现实生活的。在“天、地、人”这“三才”之中，人为中心。南宋大儒陆九渊讲“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世人可能视之为深奥或偏颇，没有人会以为这是说疯话。可是在西方文化看来，这种说法是极难理解的。因为富于情感色彩的“心”无论抬得多高，也不至于达到“心包万物”的程度。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追求一种超越尘世的意识，哥特式教堂高耸入云的尖顶引导人们向往至高无上的天国，而理性的头脑显然比感性的“心”更接近天国，更富有超越性，更适于形成带有抽象色彩的神学意识，因而也显得更为高贵。

对“心”与“脑”的不同偏好，已经不知不觉渗透到中西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人往往强调“核心”的作用，而西方人往往强调“首脑”的作用。中国人最恨的是人的“变心”，而西方人最怕的是人被“洗脑”。最妙的是，中国人可以把一些来自西方的学科或术语译成符合中国偏好的东西，如将“idealism”（观念论、理念论）译成“唯心论”，将“mind-body relation”（精神与肉体关系）译成“心身关系”，将“psychology”（研究人们感觉、知觉、思维、情感规律的科学）译成“心理学”^①。总的说来，中西文化自古以来对“用心”和“动脑”的不同偏好，既是社会文化生活的产物，又对社会文化生活有十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人们的日常习惯用语和表述方式上，还影响到中西文化的其他一些看起来远不明显的方面。

^① 《光明日报》1997年3月1日发表申荷永的文章指出，用“心理学”翻译“psychology”，包含一种潜在的中国文化的心理学，因为“心”超越了心脏和大脑，表示人的精神世界。

三、“用心”与“动脑”的不同后果

“用心”与“动脑”的区别，决定着中西文化差别的几个基本方面。

首先，“用心”与“动脑”的区别，影响到人对自然的基本态度。中国自古就有天人和諧、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这种思想传统是在“用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古人认为人有人心，天有天心。圣人怀天心，感人心，执中含和，才能使天下太平。董仲舒强调以人心副天心，以“天人感应”学说治国，使人与自然关系具有了政治色彩。与此相对应的是，西方文化在逻辑分析思维的不断作用之下，逐渐形成了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按照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见解，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当柏拉图提出用理念来识见事物，进行思考的时候，就有了把知识当做控制和设计人所面对的世界（包括人自己）的工具的可能。^①这种倾向在近代科学技术兴起后变得日益明显，而笛卡儿主客二分的唯理论提供了人与自然对立的形而上学基础。柏拉图的理念论，以及后来崇尚理性和逻辑分析的思想传统，都是“动脑”的产物。这种思想传统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导致了征服自然的大规模活动，并且在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积累后招来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在“天人合一”与“征服自然”这两种不同思想文化传统的反差中，隐藏着“用心”与“动脑”这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潜在而巨大的作用，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用心”与“动脑”的差别，还影响到人与人的关系，导致了人们对待社会生活和日常行为规范的不同态度。“用心”思考贵在灵活与变通。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是智慧的体现。中国人自古以来注重用灵活的心态研究变通的规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相当大影响的《易经》，就是对事物变通趋势和方法的一般性概括。“易者变也”，《易经》乃“变通之经典”。《易传》上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②。这种对“变通”的高度重视在中国人的现代社会生活中仍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与此相对应的是，西方文化中更重视事物特点和关系的规定性。逻辑推理的第一条规律就是“同一律”，即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每个概念、判断必须具有确定的同一内容。古希腊时期就已产生的几何学公理化体

^① 参见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128～13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② 《易传·系辞下》。

系，是体现严格规定性的非常典型的知识成果。对规定性的重视还体现在人们对法律、制度、行为规范以至道德戒律的态度上，尽管有时显得刻板甚至有些教条，但却对提高社会生活的组织化、制度化程度有相当的好处。当然，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自古以来都有很发达的道德和法律体系。但中国古代毕竟德主刑辅，人际关系中也有较多的变数。而西方文化注重人与人之间以及社会群体间的契约关系，法律和规范在调节社会生活方面也有更明显的作用。不过，强调灵活变通的文化却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传统，其文化传承绵延几千年从未断绝。而看重种种规定的文化发展却常有激烈的变革，新旧时期的更替往往使人感到面目全非。这里面有着“用心”与“动脑”差别的隐蔽作用，其中的原委还有待进一步揭示。

“用心”与“动脑”的差别，通过一系列的环节，最终决定了中西文化在社会组织结构方面的不同模式。中国文化倾向于把各种社会组织以至天地万物都看做有机整体，而西方文化则倾向于把各种社会组织按机器结构塑造出来，不仅组成“国家机器”，而且将机器模式渗透到经济和技术活动中去，从而为广泛使用物质生产的机器提供了社会基础。有些学者曾主张中国人注重群体意识，而西方人注重个性自由。^①就个人的价值取向和性格特征而言，中西文化的确存在这样的差别，但这种差别不能绝对化。西方文化对个性自由的推崇，并不妨碍其形成效能很高的社会组织。而中国传统文化看来压抑个性，但个人的精神气质和利益追求仍通过种种渠道有顽强的表现。更为根本的问题是，正是社会组织的结构形式决定了个性自由的发展空间。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群意识取决于群体中个体之间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有机联系，因而个体的相对独立性很小。而西方文化由于工商活动发达，其社会组织中个体的相对独立性很强，因而才容许有鲜明的个性张扬。注重群体意识和推崇个性自由的文化反差，作为明显的特征，影响着人们的人生观、幸福观、婚姻家庭、宗教信仰、礼仪民俗等诸多方面，而其隐性因素则是“机体模式”与“机器模式”的根本对立，以及更深层的由“用心”与“动脑”差别造成的分化。这中间很多因果关系需要仔细地辨别和剖析。

“用心”与“动脑”的差别作为一种累积的历史作用，造就了中国和西方两类风格迥异的知识体系，前者为“心术”，而后者为现代意义上的技术（technology）。“心术”一词古已有之。管子称“实也、诚也、厚也、施也、度也、恕

^① 陈独秀曾认为“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不少学者持类似的看法。参见沙莲香主编：《中国民族性》（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也，谓之心术”^①。荀子认为“蔽于一曲”为“心术之公患”^②。这里的“心术”指的是内心态度和思想方法。后人讲“心术”，多强调“术”的方面，指的是心计、谋略、招法等等。中国古代的各种知识成果多冠以“术”的名称，如智术、权术、战术、算术、方术、数术等。它们的共同特征是要靠“心”来把握，“术”的水平高低取决于“心”的灵性。学习中医强调“心悟之法”，学习书画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掌握工程技术也离不开“心领神会”。自古以来技艺以师徒传承，主要靠的是启发悟性。西方文化在古代和中世纪也有许多靠直观体验把握的技艺（technique）。但在“动脑”的理性思维和逻辑分析的不断作用下，技艺不断被知识化、规范化、理论化，逐渐实现由“technique”向“technology”的转化。近现代技术在西方文化环境中孕育而出，不是偶然的事情。近些年来，很多西方思想家对近现代技术的本质和社会后果进行反思，都把目光投到近现代技术的文化根源和文化环境上。荷兰学者冯·皮尔森曾经指出，近现代技术并非只是人体结构的外化，同时也是人体潜能的外化以及人脑的外化（尤以信息技术为代表），这是同人类文化的总体背景相联系的。^③近现代技术体系中是否还存在“用心”的成分呢？未来的技术发展中是否还有“用心”的必要呢？这些都是中西文化比较中值得重视的课题。

从“用心”与“动脑”角度来透视中西文化的差异，当然不可能触及中西文化比较的所有方面，但可能涉及中西文化比较的一些基本方面。从思维的顺序上看，大体上涉及本体论（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论、方法论、模式论、知识论（或者说技术论）这五个领域。“用心”与“动脑”的差别贯穿这五个领域，进而影响到中西文化在社会结构、人际交往、风俗习惯、语言文字、艺术风格等诸多方面的差异。这样展开对中西文化的比较，有可能使人们注意到以往容易被忽略的事情及其相互联系，在一些看似熟视无睹的社会生活素材中阐发新意，进而获得对中西文化差异和相互关系的更深刻理解。

“用心”的文化与“动脑”的文化都各有其悠久的历史，两种文化之间有着漫长的交往历程，彼此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制约、相互冲突，在世界文化史上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14世纪之前，“用心”的文化曾在世界上独领风骚，汉唐盛世成为不少外邦学习的榜样。至今大多数中国人属“汉”族，在海外称“唐人”，令人联想起“用心”的文化的昔日辉煌。西方文艺复兴之后，

① 《管子·七法》。

② 《荀子·解蔽》。

③ 参见 [荷] C·A·冯·皮尔森：《文化战略》，119~13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